

1

散文

梁晓声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iang Xiaosheng :
Essays



梁晓声

青岛出版社

散文
梁晓声文集

青島出版社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出版说明

梁晓声,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出生于哈尔滨市一个建筑工人家庭。1966年初中毕业于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1968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兵团知青”。1974年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1977年大学毕业,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辑。1988年底调入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2002年调入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授至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政协第十、十一、十二届委员。

梁晓声是中国当代文坛大家,是知青文学的集大成者。他著述勤勉,诸体兼擅,各种体裁皆有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思想深刻。他以直面现实的态度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和精致的文学创作,真诚而又爱憎分明地记述历史,深入剖析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其中渗透了社会历史的变迁、风俗人情的移易、人性心灵的内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史诗式地描绘了时代的全景。他的作品因此被称为“史性与诗性的综合体”,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风格鲜明、自成一家。

2013年11月,梁晓声授权青岛出版社出版其文集。文集出版立项伊始即获青岛市2014年度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青岛出版

社将其列为年度重点出版项目，组织相关人员实施。

《梁晓声文集》尽可能完备地辑录了梁晓声迄今为止创作的全部作品。依据体裁，我们将这些作品厘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等卷。基于这些作品的丰赡多姿和规模宏大，我们审慎编校，分期出版。这里辑录的是散文，分作15卷编排。这些作品大多曾发表过，辑入本集时，作者亲自作出选择和修订，对文章的语言和内容作了适当改动与调整，使之更加恰切。散文的分卷和编排顺序也由作者亲自审定，大体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将相同或相近主题的文章编排在一起。

梁晓声的散文创作时间跨度很大，创作背景复杂多样。在编校中，我们尽量保持作品最初发表时的原貌，对一些作家用语习惯和具有时代特色、地域特色的语汇皆予以保留，同时根据国家现行出版编校规范订正了少许文字和标点。

梁晓声的散文首次发表时都是各自独立的。此次结集，为使体例一致，我们对散文的篇章布局，文中的数字用法、引文格式等作了大致统一；确实无法做到全部统一的，各卷保持统一。

《梁晓声文集》内容博大，文采斐然。虽然我们尽可能地认真审校，但限于学养和经验的不足，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谨致诚挚的谢忱。

青岛出版社

2018年3月

梁晓声文集·散文

1

青岛出版社

目录

复旦与我	1
从复旦到北影	5
京华闻见录	99
那年的北影制片厂	190
论大学	194
小街啊小街	201
紧绷的小街	221
龙年一九八八	231
九三断想	297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328
千年之交，我心肃然	331
“七十年代”之“红”与“黑”	333
青春记忆里的“红”与“黑”	335
回眸看“小丫”	340

我与我们的共和国	343
用我们的热血喷注吧	345
论民主	347
关于民主的断想	353
论“恐怖”及“恐怖主义”	357
恐怖的掌声	362
民主与爱国	364

复旦与我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感激》。

在这一篇散文中，我以感激之心讲到了当年复旦中文系的老师们对我的关爱。在当年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我，他们的关爱还体现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真情系之的保护。非是时下之人言，老师们对学生们的关爱所能包含的。在当年，那一份具有保护性质的关爱，铭记在一名学生内心里，任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是凝重的。

我还讲到了另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

那么他是复旦哪一个系的老师呢？

事隔三十余年，我却怎么也不能确切地回忆起来了。

我所记住的只是一九七四年，他受复旦大学之命在黑龙江招生。中文系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也在他的工作范围以内。据说那一年复旦大学总共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收了二十几名知识青年，他肩负着对复旦大学五六个专业的责任感。而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中的一个，万分幸运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为了替中文系创作专业招到一名将来或能从事文学创作的学生，他在兵团总部翻阅了所有知青文学创作作品集。

当年,兵团总部每隔两年举办一次文学创作学习班,创作成果编为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通讯报道与时政评论六类集子。一九七四年,兵团已经培养起了一支不止百人的知青文学创作队伍,分散在各师、各团,直至各基层连队。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基层连队抬木头。兵团总部编辑的六类集子中,仅小说集中收录过我的一篇短篇《向导》。那是我唯一被编入集子中的一篇,它曾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

《向导》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班的知青在一名老职工的率领下进山伐木。那老职工在知青们看来,性格孤倔而专断——这一片林子不许伐,那一片林子也坚决不许伐,总之已经成材而又很容易伐到的树,一棵也不许伐。于是在这一名老“向导”的率领之下,知青离连队越来越远,直至天黑,才勉强凑够了一爬犁伐木,都是歪歪扭扭、拉回连队也难以劈为烧材的那一类。而且,他为了保护一名知青的生命,自己还被倒树砸伤了。即使他在危险关头那么舍己为人,知青们的内心里却没对他起什么敬意,反而认为那是他自食恶果。伐木拉到了连队,指责纷起。许多人都质问:“这是拉回了一爬犁什么木头?劈起来多不容易?你怎么当的向导?”而他却用手一指让众人看:远处的山林,已被伐得东秃一片,西秃一片。他说:“这才几年工夫?别只图今天我们省事儿,给后人留下的却是一座座秃山!那要被后代子孙骂的……”

这样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当年是比较特别的。主题的“环保”思想鲜明。而当年中国人的词典里根本没有“环保”一词。我自己的头脑里也没有。只不过所见之滥伐现象,使我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罢了。

而这一篇仅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却引起了复旦大学招生老师的共鸣,于是他要见一见名叫梁晓声的知识青年。于是他乘了十二个小时的列车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转乘八九个小时的列车从哈尔滨到北安,那是那一条铁路的终端,往前已无铁路了,改乘十来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黑河,第二天上午从黑河到了我所在的团。如此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

而第四天的上午,知识青年梁晓声正在连队抬大木,团部通知他,招待所里有位客人想见他。

当我听说对方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内心一点儿也没有惊喜的非分之想。认为那只不过是招生工作中的一个过场,按今天的说法是作秀。而且,说来惭愧,当年的我这一名哈尔滨知青,竟没听说过复旦这一所著名的大学。一名北方青年,当年对南方有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一向不会发生兴趣的。但有人和我谈文学,我很高兴。

我们竟谈了近一个半小时。

我对于“文革”中的“文艺”现象“大放厥词”,倍觉宣泄。

他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本当年的“革命文学”的“样板书”《牛田洋》,问我看过没有,有什么读后感,我竟说:“那样的书翻一分钟就应该放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而那一本书中,整页整页地用黑体字印了几十段“最高指示”。

如果他头脑中有着当年流行的“左”,则我后来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的一名学子。倘他行前再向团里留下对我的坏印象,比如“梁晓声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有问题”,那么我其后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分手时,他说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不要再跟别人说了,那将会对你不利”。这是关爱。在当年,也是保护性的。后来我知道,他确实去见了团里的领导,当面表达了这么一种态度——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没有这一位老师的认真,当年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学子。

我入学几年后,就因为转氨酶超标,被隔离在卫生所的二楼。他曾站在卫生所平台下仰视着我,安慰了我半个多小时。三个月后我转到虹桥医院,他又到卫生所去送我……

至今想来,点点滴滴,倍觉温馨。进而想到——从前的大学生(他似乎是一九六二年留校的)与现在的大学生是那么不同。虽然我已不认得他是哪一个系、哪一个专业的老师了,但却肯定地知道他非是中文系的

老师。而当年在我们一团的招待所里,他这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和我谈到了古今中外那么多作家和作品。这是耐人寻味的。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皆一命,是谓生日。但有人是幸运的,能获二次诞辰。大学者,脱胎换骨之界也。“母校”说法,其意深焉。复旦乃百年名校,高深学府;所育桃李,遍美人间。是复旦当年认认真真地给予了我一种人生的幸运。她所派出的那一位招生老师身上所体现出的认真,我认为,当是复旦之传统精神的一方面吧!我感激,亦心向复旦之精神也。故我这一篇粗陋的回忆文字的题目是《复旦与我》,而不是反过来,更非下笔轻妄。我很想在复旦百年校庆之典,见到一九七四年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生的那一位老师。

从复旦到北影

一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两三点钟,哈尔滨至上海的一趟火车进站。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被人流裹着,步子虚浮地出了上海站。

上海很热,三十四度左右。这年轻人穿件咔叽布的、旧的、在洗染店染过的、黑色而又变灰了的学生制服。一条崭新的、裤线笔直的“的卡”裤子,蓝色的,太长,折起一寸有余。脚穿一双半新的网球鞋。头戴一顶崭新的单帽。

他左手拎皮革旅行包,右手拎网兜,里面兜着一个新脸盆、牙具什么的。

他避开人流,有些发蒙,不知该往哪儿去。

他像东北农村某人民公社的小文书一样,更具体地说,像《艳阳天》中的“马立本”。连“马立本”那点土潇洒也没有,模样迟钝。

虽然处于“文革”时期,但讲究穿着的上海人还是比全国其他大城

市的人们明显穿得雅致。他有些自惭其“土”。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满大街的女人尽数裸胳膊裸腿的情形。他感到有些害羞,竟不知目光应朝什么地方看才算个正经的年轻人。

从他面前走过的女人们,却并不注意他。偶有一两个女人看他一眼,完全是觉得他有些“憨大”。他便更自惭、更害羞。没有一个男人像他似的头上戴着顶崭新的单帽。撑帽纸板还保留在帽子里,未丢掉是为了让帽脸儿显得更陡,给自己增添点精神。

他不由得将帽子摘了下来,塞进手提兜里。可是想到自己一个多月前剃过秃头,现在头发生出还不足半寸,一定更傻里傻气,又取出帽子重新戴上。撑帽纸板折坏了,只好扔了。单帽失去了它,不如原先那么像样。

他有几分沮丧。他是我。如果上海的年轻人们知道我随身带着一份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入学通知书,他们肯定会非常羡慕甚至可能嫉妒我这个“东北土老帽”的。那年头“工农兵学员”正吃香,复旦又是国内名牌大学。我家祖坟大冒红烟紫气!

我向一个清扫工问去复旦怎样乘车。

他上下打量我一阵,反问:“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

我不无自豪地点头。

又问:“从哪儿来?”

我回答:“北大荒。”

再问:“北大荒当地人?”

答:“哈尔滨知青。”

他说:“我女儿也在北大荒,一师三团。”

我说:“我在二团。”

他询问兵团知青的近况。我很乐意地回答了他提出的种种问题。我的上海知青朋友很多,上海话早已听惯。他对我颇产生了一点好感,末了说:“复旦大学的接站车停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我带你去。”……

我能进入复旦,自己完全没想到。

一九七三年初,我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回到我们一师二团。我是到兵团总部去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我是团宣传股报道员,兵团业余文学创作员。

回到团部刚几天,政治部主任带我到木材加工厂“蹲点”,总结“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木材加工厂是团后勤处直属连队,在团部附近,离团机关区只五六分钟的路。木材加工厂有一个鹤岗知识青年,抬大木时摔断了腿,被送到师部医院住院。腿好后,他从医院给连队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回鹤岗市探一次家。连队领导没批准。他私自回到了鹤岗。他的母亲给连队领导写了一封信,其中有句质问的话:“我的儿子千里迢迢去到边疆,在劳动中摔断了腿,我自己也在生病,难道你们当连队领导的,竟没有批准我儿子探一次家的善心吗?”可想而知,这封信使连队领导恼怒到什么程度。他一个星期后回到连队的当天,团支部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讨论对他的处分。“讨论”不过是一种形式,处分已在他回到连队之前就确定了——开除团籍。

我以团政治部工作组成员之一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基层连队的团组织特殊会议。会前我了解到,连队领导已找过一些团员骨干个别谈话,“指示”他们在讨论处分时起到“应起的作用”。团支部书记、一位哈尔滨姑娘,对连长和指导员的“指示”当然心领神会,毫无异议,“坚决照办”了。这种做法,本应被列为破坏团组织原则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小动作”,是不光明正大的,也是对每个团员意志施加的压力,更不利于一个基层连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在那个鹤岗知青痛哭流涕地反复承认错误,作了检讨之后,在经过一阵沉默之后,在由团支部书记宣布给予他开除团籍的组织处分之后,在那几个连长、指导员找他们个别谈过话的团员骨干同时举起手之后,在其他团员们十分犹豫的时候,我忍耐不住了,开口发言了。我的性格不允许我在那一时刻保持沉默。而当我对什么事情不赞同的时候,我的言词往往是尖酸刻薄的。我当时说了些什么,无须赘述。总之,团支部

书记兼副指导员显得非常尴尬和难堪,几乎是愤愤然地吩咐一个团员:
“去把连长和指导员找来!”

连长来了。指导员也来了。两位连队领导的“坐镇”局面,使气氛格外严峻。这种严峻的气氛,将我推到了被迫“迎战”的地位。而人一旦被推到这种地位,哪怕是一个沉着练达的人,有时也会变得一反常态,激昂慷慨起来的。我天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沉着练达的人。我的气质中有种易于冲动、易于激昂慷慨的不良基因。而我一旦冲动起来,岂止“激昂慷慨”而已,简直可以说“目中无人”“气冲霄汉”!尤其当我深信正义是在我一方时,我是颇有点不怕天不怕地的。

我当时又说了些什么,连我自己如今也记不清了。有一点却记得很清楚,连长没坐多一会儿,就一言未发、面色青白地拂然而去。指导员比连长涵养好,默默地吸了两支烟,也站起身走了。他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离开前狠狠踩灭烟蒂的动作,也够令人“触目惊心”的。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工作组成员的身份,他当时绝不会表现得那么有涵养。团支部书记也要起身走,我把她叫住了,对她说:“团组织会还没开完呢,你不能走!”她只好留下,眼泪汪汪的,几乎快哭了。

多数团员知青,对于出现了这样一种他们万万料想不到的、“剑拔弩张”的局面,既感到震惊,也暗暗感到钦佩。我无形中成了代表他们被压制的意见的人。他们主张继续表决。表决的结果——给那个鹤岗知青警告处分。这等于是对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剖析起来,我的“仗义执言”,倒并非主要是受所谓“正义感”的驱使。还有更为主要的,当时连我自己也根本不可能意识到的心理因素起重要作用。这种心理,就是身为一个知识青年,经常受到种种抑制性的不正当的“管束”,人格被“领导意志”随心所欲地扭曲,情绪被外界力量无端地粗暴地施加骚扰,寻找机会想得以发泄、表示反抗的心理。不过在什么机会下,以什么事件为导火索,以什么方式发泄和反抗,因人而异罢了。这件事,我在我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作为“情节”移植到

女主人公李晓燕身上了。

我以我认为恰当的方式发泄了。我的心里感到了一种发泄后的满足,感到了一种类乎“大获全胜”的痛快,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然而,“大获全胜”的不是我,也不可能是我。我不过扮演了一次“堂·吉珂德”式的惨败者的角色而已。我已说过,从木材加工厂到团部只需五六分钟。刚表决完,还没散会,我就被叫去接电话。是政治部主任从团部打来的。

“放下电话,立刻跑步到我的办公室!”政治部主任在电话中用异常严厉的语调命令。

我没跑步,但走得很快。走进政治部主任办公室,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坐在办公室里,都幸灾乐祸地瞧着我,都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气。

“从今天起,不,从现在起,你不再是工作组成员了!你必须在木材加工厂团支部会议上作深刻检查!”主任对我拍桌子瞪眼睛。

“没什么可检查的!”我恼火透了。

“你太放肆了!”主任气得脸色紫红。

我顶撞道:“作为一个人,我有权放肆一次!”

主任腮帮子抽搐,说不出话。

“小梁,你何必发这么大火呢!有话好好讲嘛!”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虚伪地劝说我。

我狠狠瞪了他们一眼,走出了主任办公室。政治部主任对我没有半点好印象。他给我的印象更不怎么样。我从连队调到宣传股两个多月后,我们连的文书、一位小巧玲珑的“安琪儿”般的牡丹江姑娘,也调到了团部组织股。她报到的当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她肩并肩向机关食堂走。政治部主任吃罢了晚饭,迎着我们俩往回走。相距三十步远,我就发现他的五官往一块儿挤,在脸上挤出了一堆笑。尽管我不爱看他那种笑,但却认为他是在对我笑。自从我调到宣传股后,他只对我简短地说过几句例行公事的话,还从没对我笑过。主任对我笑,而且是第一次,仅仅出